

“脱贫头雁”独臂撑起“V”型人生

“

20年前，他是村里的致富能手、最早骑上摩托车的“拉风”青年。9年前，一次意外触电事故，导致他右臂截肢，左腿残疾，仿佛噩梦一般，人生急剧坠落，小康之家变得一贫如洗

“别人把我当成一个废人，他们越这样想，我就越要干点事！”

现在，他是村党支部书记，是上百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奔小康的带头人和主心骨



▲6月11日，李健（左）在桐柏县埠江镇付楼村黄金梨种植基地查看黄金梨套袋情况。本报记者郝源摄

本报记者李亚楠、何娟、李鹏

河南省桐柏县埠江镇付楼村党支部书记李健走过半辈子，他总结自己悟出的“天命”：“人生没有平坦大道，高低起伏才是常态，翻过一道沟，还有一座山！”

每次回想起改变他人轨迹的那次事故，李健都觉得仿佛噩梦再现。

2011年12月30日下午，他和邻村三名电工在寒风中检查村头变压器。

“我踩着铝合金梯子，脚下猛然一晃，身子跟着向后一仰。我下意识伸出右手向前一抓，瞬间碰到变压器接线柱，然后就失去了知觉。”

工友回忆，李健戴的头盔冒出白烟，右手烧焦，左腿的内侧烧没了，黑色的骨头露在外面。

他被紧急送到河南省桐柏县埠江镇卫生院，医生断言“基本活不了”，连病房都没让进。晚上转到市医院抢救，医生看他伤势太重，可能活不过24小时，只让交了400元住院费。

然而，凭借超人的求生意志，经过8次手术的救治，李健活了下来。医生都说：“他能活下来是一个奇迹。”

活下来的李健，判若两人。右臂截肢，左腿皮肉血管严重坏死，医生只好嫁接右腿皮肉，同时取右腿和腰部的骨头植入，让左腿再造重生。

“为了保住腿，又做了3台手术。我在病床上一动不动躺了整整49天！好几次都想从病房窗户跳下去，一死百了。”住院那些日子让李健的身体

痛苦不堪，更有心理上的折磨。

闯过“活下来”的“鬼门关”，还得闯过“站起来”的“鬼门关”。医生说，他的左腿最多只能恢复到马蹄脚那种程度，一点一点往前挪，拐不了弯。

“那样走路太慢，我就不信这个邪！”李健从只能拄拐棍勉强站立，到扶着安装轮子的凳子慢慢挪，再到拄着拐棍在屋里走，最后拽着扶手上下楼梯锻炼，半年多后，李健不仅能不借外物走路，还能帮家里做点事情。

这次意外，李健不仅耗光家底，还借了不少外债，眼前的家庭状况让他犯愁：父母快八十岁，弟弟二级智力残疾，妻子有慢性肾炎，儿女都在上学。日子怎么过，成为“走起来”的李健又一道不得不闯的“鬼门关”！

“身体残疾了，志气不能残疾”

越是困难，越容易怀旧。那段时间，李健常常回想起自己在村里风光无限的日子。

脑筋活、敢做事、热心肠、好帮人，是村里人对李健的一贯评价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凭借种葡萄和黑木耳，李健赚了二十几万，率先在村里盖起了二层小楼，骑上了大阳摩托。当上电工后，碰到生活拮据的孤寡老人，他会帮着交电费。

命运却和李健开了这么大大一个玩笑，李健一度觉得自己成了废人，整天闷在家里。

就在李健居家养病的2013年，党中央提出“精准扶贫”，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。

2014年初，李健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。时任埠江镇镇长的王诗东作为帮扶人走进了李健的生活。“刚见李健时，他情绪很低落，整个人垂头丧气的。”王诗东很理解李健的心境，除了帮李健落实各项扶贫政策外，他有事没事找李健闲聊，鼓励他做事情。

渐渐地，李健想明白了，发生的事情不可逆转，但未来的命运还可以把握。闯过两道“鬼门关”的他，决定再和命运斗一斗，“身体残疾了，志气不能残疾！”

当年，邻乡的大葱销量很好，擅长做生意的李健对数字格外敏感，“一亩地能出一万斤葱，一斤最高能卖1.2元，除掉成本，一亩地净赚5000到8000元。我觉得这是一门好生意。”

说干就干，李健很快找亲友借了30万，流转120多亩土地种大葱。

拖着还没有完全恢复的左腿，他每天第一个到地里干活，晚上工人走后才回家。长时间的体力劳动，让他的左腿流出血水。

然而，现实再次给了他沉重一击。2014年大葱行情不好，出现滞销，李健只卖掉了八九万元的大

葱，剩下的几十亩大葱只能毁掉，一下子赔了25万元。

不仅如此，2014年底，父亲骑三轮车外出时被电动车撞倒，大腿骨折。紧接着，母亲突发心梗，送到医院不过一天就去世了。第二年，妻子又因为脑出血而偏瘫。

“那个时候我天天流泪。”想起那段艰难的日子，李健止不住地叹气。

“宁肯苦干，不要苦熬”

王诗东担心李健从此一蹶不振，上门更加频繁，和他一起分析市场，寻找销路。

他不知道，燃起斗志的李健眼里流泪，心里却流淌着一团火。

实际上，2014年，在人生最困难的阶段，李健就出人意料地提出了入党申请。这让王诗东感到意外，也感到欣喜，“这说明他从思想上站起来了，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，就不会倒下。”

2015年7月，李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党员身份让他斗志更足。李健到省内外十几个城市考察大葱市场信息，有信心来年一定赚钱。但亲戚们都不支持他继续种大葱，不愿再借钱给他，甚至劝他去城里乞讨。

“在农村最没志气的人才会去要饭。别人把我当成一个废人，他们越这样想，我就越要干点事！”李健说。

没有退路，就只能往前冲。在王诗东的鼓励和帮扶下，李健决定再拼一把，种了60亩大葱，其他土地种上玉米、水稻和树苗等。因资金不够，种子、肥料等都是赊的。

背水一战，李健投入更多精力，他提前联系好了省内外蔬菜批发市场的老板，销路问题得到了解决。2016年，大葱卖了70多万元，扣掉成本，再还掉欠账，最后净赚13万元。

“不要以为我是残疾人就不能干成事，村里有些正常人还没我能挣钱呢！”李健吐露了憋在心里已久的话。2016年，李健顺利脱贫。

2017年，葱价再次暴跌，已建立起销售渠道的李健，并未遭受太大影响，许多葱农还找到李健，想借他的渠道把自家大葱卖出去。

“村民找我帮忙，是信得过我！”李健来者不拒，当年帮村民卖了30多吨大葱，最远的卖到了山东菏泽、河北邯郸等地的脱水蔬菜加工厂，帮助村民挽回了部分损失。

有人向李健讨教致富法宝。李健告诉他们，“哪有什么法宝？人呐，宁肯苦干，不要苦熬。”

“我们只要跟着干，也能慢慢富起来”

正是靠着苦干苦熬不放弃，李健迎来了人生的柳暗花明。

本报记者段菁菁、郑梦雨、席玥

江南梅雨歇。夜幕降临，水乡巷陌间，胶片投影机发出的光柱伴着蝉鸣，再一次照在黑瓦白墙上。

在浙江嘉兴的一个小村里，王志华、朱文炳、朱生荣、朱强四代电影放映员，“接力”放映电影50余年。“流动电影院”又开场，“哒哒”的走带声转出了光影老味道，也转动了整村人的文化生活。

数字时代的陡然降临“逼退”了胶片电影，而胶片放映的传统技艺和古老滋味，却在他们的双手间，在一帧一帧的胶片画面间，一代代传承着。

第一代

摇橹船上的“水乡电影”

浙江嘉兴桐乡市洲泉镇马鸣村地处江南水乡，境内河流成网、航道纵横。时光倒回60多年前，除水路客运和货运外，河道间时常摇来一条“电影船”。

船上载着一百多斤的放映机、几盘胶片、卷起的幕布和一只高音喇叭，徐徐靠向岸边的村子。几样物件看似简单，却寄托着当地村民日常劳作、跑船生活中最美好的期盼。

1952年，17岁的王志华初中毕业，随后进入为期半年的电影培训班，学习放映技术、电工、使用和维修发动机及发电机等课程。一毕业，他便承担起当地放映电影的任务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第一代电影放映员。

“那时放电影很艰苦，每个县（当时仍为桐乡县）只有一支电影队，一支队伍要照顾20到30个村。”今年已85岁高龄的王志华回忆。虽然几乎一年四季都漂泊在外，但每次一看到越来越多的观众围上来，他也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有了意义。

“那时没有电视、没有广播，一个月才放一场电影。”王志华笑着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在桐乡崇福镇大操场放映电影时的热闹场景：“得有七八千人到场，相当于一整个县城的人都来了。”

为服务当时常在水路奔波的跑船人，王志华也会靠向岸边为他们放映“专场”。他回忆，50年代中期有次放黄梅戏电影《天仙配》时，河道里集聚了大概上百条船。

在他印象里，放映的电影以国产片为主，也有部分苏联译制片。故事片《白毛女》以及被称为“老三战”的《南征北战》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等最受百姓欢迎。“潜移默化中，看电影成了村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需要。”王志华感叹。

1973年，王志华开设了自己的第一期电影放映培训班，手把手教授3名学生。此后的25年里，他坚持开设了40多期培训班。时至今日，他的学生遍布桐乡县市乡镇。

四代人「光影接力」
五十载「影润水乡」

第二代

村村挂银幕，人人看电影

扁担挑音箱、毛竹做支架、麻绳绑银幕，加上一台放映机、一部幻灯机和一个发电机，构成了第二代放映员朱文炳的“流动电影院”。1973年，23岁的朱文炳师从王志华，退伍后在乡下电影队放电影。

朱文炳还记得自己放映的第一部电影是样板戏《智取威虎山》。那是一个大年初一，洲泉镇人民广场上聚了3000多人，“连树上都是人”。电影里大雪纷飞，电影外大伙儿穿着厚棉袄，120分钟的电影挤着站着看完。“当时观众太多了，生怕放映机出毛病，我紧张得不得了。”朱文炳回忆道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放电影都是村里的一件“大事”——提前一周就把毛笔写的电影海报贴



▲6月30日，朱强在当晚电影开播前调试放映机镜头焦距。本报记者郑梦雨摄

上，一个月放三场，10个村轮流放，远近亲邻统统过来，“盛况空前”，家家户户抢着请放映员吃饭。村里的文艺生活相对匮乏，电影投影的那一束追光，对村民而言，也像是一处点亮通向外界生活的文化窗口和精神通道。

胶片一旦转起来，就要从头到尾放完，非极端情况中途不停机。“只要有人看，我们就放，这关乎大伙儿对我们的信任。”朱文炳说，一次放映时突然下起大雨，观众自愿帮忙抢救机器。

彼时一场电影票价6分钱，最旺时一晚要去三个地方放映，等第三场开始已是午夜2点，还有很多人满心欢喜地站着等。深夜电影放完，江南水道上起了一层白雾，那是冬天，到处白茫茫，行船找不到方向，大伙就在原地等雾散了再走——朱文炳说，亲历胶片电影的最黄金时代，何其有幸。

第三代

大树剪下枝，又生出枝繁叶茂

1986年，朱生荣在部队后勤部门放了三年电影。因为经验丰富，退伍后就接了朱文炳的“班”，成为第三代放映员，背着机器继续奔波在各个村落。

直到20世纪90年代，乡里第一家影剧院建成，银幕从户外“搬”进了室内。乡亲们坐进宽

敞电影院，再也不用为“只闻其声不见其影”而发愁。

有了固定放映场所，本不用再主动“送戏上门”。但朱生荣觉得，总会有一些村民因为路途遥远不便赶来看电影。他利用在影剧院工作的闲暇时间，和另一位放映员成立了“义马乡兄弟电影队”，把机器装在摩托车上，专门为偏远农村的老人孩子放电影，一放就是十余载。

“要想把村民重新拉回银幕前，就得了解他们的真切想法。”朱生荣说，以前村民娱乐休闲方式少，幕布一拉，不管放什么，附近十里八村都会赶来看。“90年代，很多村民虽然家里有了电视，但随着村子里留守的人越来越少，特别是偏远地区，大家住得散，内心感到孤独，很想求个热闹。”

“平时难得打照面，其实就趁着看电影的机会，大伙儿聊聊天，交流交流，这是在家里看电视得不到的乐趣。”朱生荣说。

村里办喜事，乡亲们也会找来朱生荣的电影队。“有一户人家喜逢老人百岁五世同堂，我就给他们放了一部《五女拜寿》。”朱生荣说，虽然放映队的任务不再纯粹是放电影，但能给乡亲们带来快乐，繁荣农村文化阵地，他的工作就有意义。

“就像从大树上剪下一株枝条，把它扦插

在土地里，又生出了枝繁叶茂。”从小在电影队里长大的朱强这么形容父亲的放映队，而这枝条也渐渐在朱强的心中生了根，发了芽。

第四代

光影经年沉淀，再次光彩动人

严格意义上讲，胶片电影放映的使命在朱生荣手上已经结束了。

进入新世纪，国内影院开始大量普及数字电影，胶片电影从历史的长河中逐渐退场，取而代之的是彩色宽银幕。2006年，朱生荣在隔壁村子的通桥仪式上放了最后一场胶片电影后，默默跟了他半辈子的“老伙伴”封存进库房。

朱生荣一度觉得，他的放映人生就此告一段落，直到儿子朱强的马鸣电影机展示馆开张。

从小在电影幕布前长大，这位85后的年轻人对胶片电影有着近乎“偏执”的热爱。朱强说，时至今日，他最爱的电影依然是20世纪80年代拍摄的《城南旧事》，“胶片电影不管从故事内容、表现手法还是精神内涵，在电影历史上都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。”

2014年9月的一天，朱强在杭州办事过程中，碰巧遇到一位收旧货的老人正在砸一个老电影放映机，想把上面的铝壳取下。朱强当即“救下”了这台老电影放映机。

查阅资料，他发现这个放映机竟是“长江老五四”——1954年中国仿造的苏联“乌克兰”16毫米胶片放映机。那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放映机，数量甚少，深受电影发烧友追捧。

至此，朱强开始到处搜寻老式电影机和相关设备。“前几年，全国各地不少老影院倒闭，一般会对音响等设备进行变卖，他们出售的音响设备不仅效果好，而且价格便宜，我常去购买。”几年下来，光是购买各类电影机设备器材，花费就超过150万元人民币。

如今，在300平方米的电影机展示馆里，收藏着近百台各类型经典放映机。这里不仅承载了一个时代的记忆，也为几代放映员提供了“重温手艺”的地方。

“我要把老电影文化传播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。”如今，朱强又重新拾起父亲的老行当，扛着机器走上广场、走进校园，讲述为中国人提供了近半个世纪“文化大餐”的胶片电影背后的故事。

“小暑”过后，梅雨暂歇。朱强想利用难得的晴好天气，为离洲泉不远的乌镇乡亲放一场露天胶片电影。

卸设备、架放映机、调音响，朱生荣父子熟练认真地操作着每一个环节。很快，两台珍藏的老式35毫米电影胶片放映机就转动起来。

“哒哒哒……”经年沉淀的光影，在白色的幕布上，再一次光彩动人。